

doi: 10. 3969/j issn 1672-0598. 2009. 05. 018

# 明清时期生员赈济原因之探析\*

袁昌曲

(西南大学 历史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在明清荒政文献中,官方对生员这一特殊群体之赈济颇为常见。究其原因除灾荒因素外,更多与生员在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与危机;生员出现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以及生员出现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之冲击等因素不无关系。以灾荒为切入点对其考述,不仅能展示此时期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变化之侧面,更能管窥明清社会萌发的诸多新动向。

[关键词] 明清;生员;赈济;荒政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9)05-0097-04

明清官方赈济除关注农民群体外,荒政文献中还出现了对生员这一有别于民的特殊群体之赈济。目前学界围绕生员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然从赈济这一视角来审视生员群体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就其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而言,无论从社会史的角度对生员贫困化趋势的考察,抑或是从救荒史的角度对其专门性赈济探讨,都未注意对赈济原因加以专门深入之分析。固然灾荒势必引发对生员赈济,然这并不能对其全面诠释,显然对明清生员赈济原因之考察,除灾荒因素外,事实上牵涉到对明清两代生员与之相关问题层面的深入思考。本文对此作尝试分析:

## 一、源于生员在社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般而言,所谓“生员”确切之意是“官学生”,亦即指在州、县学或府学里的学生。明清时期,其不仅包括中央国子监的“国学生员”,明代更主要

是指地方政府学校的儒学生。

就明清两代生员在社会中究竟处于何种重要地位和作用,大致需从三方面关系来解析。首先,生员与教育体制和官僚机构有着紧密之联系。“明制,科目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出才以应科目者也。科举必由学校,则学校起家则不由科举”。<sup>[1]</sup>据此可见,自明代始,形成了一条入学校(读书)、登科举(考试)、终出仕(做官)三位一体跻身权力阶层的流动之路。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生员成为流动的主体,从流动之终点可看出生员成为明清各级政府机构能源更新的源头。无论官僚机构的创立、更新、完善至废除,抑或是官员队伍整体建设与稳定,生员都已是一支再生力量,势必影响至国家机构的存废乃至国家的兴亡。其次,就其与官方意识形态关系来看。明清两代均以儒学立国,学校教育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生员作为官学生,在

\* [收稿日期] 2009-02-20

[作者简介] 袁昌曲(1977-),男,重庆黔江人,硕士,重庆西南大学,主要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

关于生员相关研究成果:最早当推顾炎武。其后著名学者吴晗、张仲礼、何炳棣、夫马进等在其相关论著等均有涉及,值得一提的是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和地方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为明代生员研究专著。

与生员赈济有关研究:魏丕信著.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09;张建民.灾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J].武汉大学学报,2006(01):47-55.陈宝良.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02):60-61

对生员概念界定:张仲礼对绅士集团进行分层,生员归属下层绅士;陈宝良对明清生员范围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界定。其本质是一致的,本文用的是后者界定之意,亦即主要指地方政府的儒学生。

学校接受各种伦理教育,被统治者打造成为儒家道统的卫道士、推行者和代言人,肩负着卫护纲常伦纪的使命,成为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最后,就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来看。生员对地方官民关系的协调和地方秩序维系方面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在明清两代地方社会,中央力量止于府、州和县一级,在地方基层组织中,乡绅控制地方社会。生员作为下层绅士,虽在学问、财力还是声望都无法成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但其作为绅士集团中最大的群体,无不与地方官和乡绅发生联系,且任何有关乡村事务管控离开了生员的参与和协助都难见成效,在某种程度上生员成为介于地方官、乡绅与庶民之间的一支左右地方行政重要的力量,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sup>[2]</sup>

以上可见。当生员遭遇灾荒或其它原因使其生存受到极大威胁时,解除生员面临的生存威胁,维系生员所代表的官方之正统意识和王朝秩序,成为官方赈济的深层次原因。

## 二、生员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动摇和危机

明清两代延续了宋代创立的设学田以赡学之制度,学校常设专门机构通过租佃或委托他人经营获得学租,以确保培养士子,显然学租成为生员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其目的以确保源源不断地向官僚机构输送所需人才。明洪武十年四月,诏立天下学田之制,将学田“立为三等,府为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七百石,应天府学一千六百石,各设吏一人,以司出纳,师生月给凵膳一石,教官俸如旧”。<sup>[3]</sup>清初沿袭这一制度,乾隆三年,再次重申:“至各省学租,务在通融散给极贫、次贫生员,稗沾实惠,此联体恤生员之意”。<sup>[4]</sup>全国各地学校皆置学田,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收支制度,形成府、州、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田”<sup>[5]</sup>之局面。在民间,地方一些较大的宗族势力在族田中专划一部分作为“学田”或“书田”,以协助族人子弟应试。如:浙江“会稽孙氏,专置应试田供族内童生院试,生员乡试及举人会试路费”。<sup>[6]</sup>大多地方均有不少类似的事例。以上看出,从官方至民间,置学田以赡学乃为明清已存较为普遍的养士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明清以来,伴随土地兼并不断强化,加之吏治腐败,学田助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已徒

具虚名。特别是清代以来,出现了学田被吞和挪用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三种方式:一是为官吏和豪强地主侵吞和兼并。如: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岳麓书院在明代时期艰苦积累的学田,为豪强所占,到康熙年间,已是“皆不可卒问也”。<sup>[7]</sup>二是寺院僧徒对学田侵占。道光年间,黎世序官准海道,将崇实书院被普应寺僧占去的膏火地600亩,请出复归书院。<sup>[8]</sup>三是佃户对学田隐瞒,有些捐户违反契约,擅卖所捐学田,一些租佃户借灾荒诡称亩数不足,拖欠学租。以上表明,土地兼并的强化,促使了这一赡学制度呈现出崩溃瓦解之势,当生员生存来源面临枯竭时,官方对其赈济提上议事日程就不奇怪了。

## 三、生员出现普遍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

考察晚明以来生员之收入与生计,其生活相对贫困化且加剧之势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虽然生员每年仍然能够拿到10个银元的奖学金,条件是三年到六年必须参加举人考试(相当于西方的学士考试),这当然无法解决一切问题。<sup>[9]</sup>在明代,一个塾师必须每年挣得脩金50两,方可维持在京城全家整年的生活。一个生员,一年得到的廪膳银,多者仅18两,维持一家生活尚属勉强。明人唐文献在描绘自己做生员时的窘境:“我往时做秀才,每至岁残,则有贫窘奔波之苦,必事一两月。至新春开卷,甚觉粗疏。”<sup>[10]</sup>清代生员层里,贫穷者颇不少,《儒林外史》中描写范进中举前的家庭拮据情况正是其现实生活的反映。

明中叶以降,出现了许多从学田中分化出来专门用于资助贫士学问的学田,如崇祯时,宁波知府陈之美亦于鄞县置田十亩三分,“解府赈济贫士”。<sup>[11]</sup>清以来“贫士学田”更是大量出现,顺治十四年,又诏令各省清厘学田,不许豪强隐占。州县逐一清厘学田田租,用来赈济贫生。以上“贫士学田”及统治者对贫生给赡重视,也从侧面表明贫生问题较为突出,说明自明至清生员日趋相对贫困的趋势,且清以来人口快速增长使生员群体流动的壅滞,使得生员相对贫困化大有不断加剧之势。

毋庸讳言,晚明以来,生员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的趋势之扩张与蔓延无不影响至官僚机构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因此官方赈济行动即使不在灾荒时期,亦势在必行,灾荒突来,更是迫在眉睫。

#### 四、生员社会流动引发对传统社会秩序极大冲击

明中叶以降,全国生员人数剧增而功名有限,一些生员在仕进无门的窘境下,不得不另谋出路而流入社会,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一是生员养成无赖之气并与地方无赖势力勾结,共同把持地方事务。故顾炎武将乡宦、生员和胥吏并为病民的三种力量。<sup>[12]</sup>二是部分生员流入社会,于晚明形成“学变”浪潮,且这一浪潮又与同时兴起的“民变”运动相呼应,不断地冲击着王朝秩序。如从成化十九年(1483)至明亡,约发生了27次较大的学变事件。<sup>[13]</sup>其中有些事件走向极端,直接谋反朝廷。最后是形成弃儒就贾运动。明中叶以来,弃儒就贾日盛,这一趋势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商人阶层之力量,其影响一方面冲击专制皇权。在晚明特别是“在宦官擅权的情况下,士商的政治联盟形成的市民运动以共同对抗以宦官为代表的专制皇权”。<sup>[14]</sup>另一方面动摇统治阶级之正统意识。明代文学家山东章丘李开先,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为商人说话,肯定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后期封建经济里的作用。此现象表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反官方正统意识的思想家。士商合流运动对皇权、正统观念的冲击,都已说明清社会正在萌动着新的变化。虽很多士人因科举功名的价值体系之作用,走上了一条弃儒就贾,终又贾而好儒的道路,致使这一趋势并未对传统政治体制或统治秩序构成颠覆性的威胁。毋庸置疑,士风嬗变、学变浪潮和士商合流运动已从多方开始挑战传统,当生员社会流动带来危机乃至破坏性时,对其赈济就不言而喻了。

#### 五、灾荒引发的生存危机是对其赈济的重要外部因素

明清两代灾荒频发,文献中对生员专门赈济,至少在明后期已出现。如:“凡遇灾饉,当先令学官遍列贫生姓名,分上、次二则,并着地方人等开报处士之饫诗书、敦行谊而贫不能养者,官司廉实,设储,预备仓有积,轸恤更不难,办毋待期自行请乞,伤廉耻之素心可也。”<sup>[15]</sup>清代最早见于乾隆元年(1736):乾隆元年议准:“被灾贫士,向不在齐民赈恤之列,原以郑重斯文,但贡监生实有赤贫无食者,令报明该教官造册,转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量加抚恤”。<sup>[16]</sup>

以上至少可判断两点:一是明清两代灾荒期间官方贫生赈济已成为事实,在这一行动的背后既是灾荒之使然,更是自晚明以来生员相对贫困化且不断加剧趋势所致,二是官方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为维护读书人的面子,赈济有别于齐民,实行一套相对独立的赈济系统。

另外,记载内容中还出现了生员冒赈现象:“文生白淑通及乡约白玉等捏开户口,多领赈票之事。查捏冒贪利,已属不法,乃该生身列胶庠,不遵王法,竟至聚众抢犯,情节尤属可恶”。<sup>[17]</sup>上述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不少生员的“廉耻之心”和“穷约自守”的道德形象在灾荒面前遭遇严峻挑战已难以成为道德的模范。更有甚者走向反面,进而挑战皇权,文中“不遵王法”足以说明。由此看到部分生员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抉择面前,不得不摘下斯文的面纱,使其人性得到了真实的暴露,其从“以言利为耻”的清高境界中走上了“利重义轻、治生为本”的世俗化生存之路,这一过程中生员群体人格特点已出现诸多变化。据此不但能更清晰地认识灾荒与赈济的关系,更能从中揭示出生员的人性变化之侧面,为我们启发在生员与社会互动中更多思考空间。

#### 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官方对生员赈济之行动,不惟发生于灾荒场景,其实在正常年景,也特别重视对其赈济,只是在灾荒这一特殊时期尤显突出。以灾荒切入考察官方对其赈济诸多原因。不难看出,生员群体出现的变化实际已成为明清时代社会发生各方面变迁之缩影。从对其赈济之因解析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此时期统治阶级所力主的正统意识与王朝秩序、社会经济变化之现象(地主经济的强化致使学田制度走向崩溃)及部分生员群体本身人格精神之消解(从以言利为耻到利重义轻、治生为本观念突破),更反映出明清以来社会等级秩序的解体和社会流动的新动向(士商互动)等相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此有待深入探讨。

#### 【参考文献】

- [1]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9[M].中华书局,2007.1675.
- [2]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和地方社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

- [3] 钦定皇朝文献通考. 卷五十. 四库全书. 六二七册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96-397.
- [4] 童穉. 钦定学政全书. 卷三十二. 优恤士子 [M]. 乾隆五十七年重修本.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8.
- [5] 钱蓉. 清代学田来源试析 [J]. 清史研究, 1998 (04): 46.
- [6] [清] 孙凤墀. 会稽孙氏宗谱. 卷 1 [M]. 东方出版社, 2003. 7-8.
- [7] 杨慎初. 岳麓书院史略 [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131.
- [8] 盛朗西. 中国书院制度史 [M]. 上海中华书局. 1934. 转引钱蓉. 清代学田经营管理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3 (02): 14.
- [9] [德] 马克斯·韦伯. 洪天富译. 儒教与道教 [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108.
- [10] [明] 唐文献. 唐文恪公集. 卷 16 家训.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影印明杨鹤. 崔尔进刻本. 集部 170 册 [M]. 629.
- [11] 重修浙江通志稿 [M]. 杭州古籍书店, 1984. 122-123. 124.
- [12] [清] 顾炎武. 亭林文集. 卷 1. 生员论上. 顾亭林文集 [M]. 中华书局, 1983. 21.
- [13] 陈宝良. 明代儒学生员和地方社会 [M].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06-408.
- [14] 余英时. 现代儒学回顾与展望 [M]. 三联书店, 2004. 223.
- [15] 李文海, 夏明方. 中国荒政全书. 第一辑 [M].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3. 413.
- [16] [清] 杨景仁. 筹济编一 [M].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534 册 [Z].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3. 299.
- [17] 李文海, 夏明方. 中国荒政全书. 第一辑 [M].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3. 772.

(责任编辑:杨睿)

##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relief to official student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AN Chang-qu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famine relief measures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frequent that the government relieved official students. The reason for the relief is closely related to such factors as famine, social status and role of official students,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students, relative poverty and continuous aggravation of the poverty in the students, social flow to impact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so 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ief based on famine, which not only reveals the side of personality change of the official students in this period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new trends of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fficial students; relief; politics in hungry time